



THE LIVES OF
ERICH FROMM:

LOVE'S PROPHET

爱的先知 弗洛姆传

[美] 劳伦斯·弗里德曼 (Lawrence Friedman) —— 著

郑世彦 计羚 —— 译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沉潜十年之作

深度讲述精神分析大师、《爱的艺术》作者弗洛姆的非凡历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THE LIVES OF
ERICH FROMM:

LOVE'S PROPHET

爱的先知 弗洛姆传

[美] 劳伦斯·弗里德曼 (Lawrence Friedman) —— 著
郑世彦 计羚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的先知：弗洛姆传 / (美) 劳伦斯·弗里德曼著；郑世彦，
计羚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6

书名原文：The Lives of Erich Fromm : Love's Prophet
ISBN 978-7-5057-4634-3

I . ①爱… II . ①劳… ②郑… ③计… III . ①弗洛姆
(Fromm, Erich 1900-1980) — 传记 IV . ①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040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717

THE LIVES OF ERICH FROMM : Love's Prophet
by Lawrence J. Friedman
Copyright © 201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Standway Book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 RESERVED

书名	爱的先知——弗洛姆传
作者	[美] 劳伦斯·弗里德曼
译者	郑世彦 计羚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益利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 26 印张 346 千字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634-3
定价	79.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78009

爱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答案。

——埃里希·弗洛姆

他（人类）面临的选择，要么是逃避自由的重担，进入新的依赖和服从；要么是基于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充分实现一种积极的自由。

——埃里希·弗洛姆

序 言

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作为纽约城市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一门社会科学的荣誉课程^[1]。我们被要求阅读40到50本自希腊时代起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包括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于是接着又阅读了他的《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是弗洛姆的热心读者。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写作手法，既避免了晦涩的专业术语，同时却清晰有条理地呈现了重要且复杂的观念。同样，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也具有这种天赋，这部重要且杰出的学术传记就是证明。它是我近年来读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作品之一。

弗洛姆的作品对我的吸引力源自于我的成长背景。我的父母从东欧移民而来，我曾在希伯来语学校学习多年，接触过《犹太法典》，尤其是犹太教的先知传统。弗里德曼的这本书清晰且细致入微地向我们展示了弗洛姆是如何例证这种先知传统的。弗里德曼虽然是一名社会批评家，但他对于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同样抱持希望。生活在那个核危机时代，弗洛姆没有将自己的使命局限于学术写作、思考或精神分析实践。弗里德曼发现，在冷战的高峰时期，弗洛姆已经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并且可能帮助总统修正了好战言论。确实，肯尼迪随后开始使用类似弗洛姆的语言和逻辑来呼吁和平共处与核裁军。在那个危险的年代，弗洛姆

[1] 一个给优秀学生的特殊的学习机会，或称资优课程。——译者注

与诸如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等重要政策的制定者保持着定期联系，并且经常在国会委员会上就战后德国的发展问题发挥他在国际关系上的专长。弗洛姆也乐于与一些国家的元首打交道。这些都是他为了消除高级政府官员和人权与和平主义者之间的隔阂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事实上，他正是国家理智核政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以及后来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和主要资助人。弗里德曼基于对所掌握的材料的研究，在这部传记中第一次揭示了这些重要的人际关系和机构关系。

弗洛姆早年的生活对他后来的思想有重要影响。对于弗洛姆复杂的早年生活相关文献的详尽分析，是这部卓越传记的另一个“第一次”。他的父亲性情急躁，母亲郁郁寡欢，这促使他尝试摆脱功能失调的家庭。这些经历最终引导他成年后聚焦于“社会性格”的研究。弗洛伊德强调力比多能量塑造个体性格的作用，与其不同的是，弗洛姆越来越强调，人是社会性存在，受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影响。这些观点在正统的精神分析圈子里被视为异端，尽管弗洛伊德有时也发现它们是值得考虑的。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弗洛姆努力将受到迫害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同事从纳粹德国转移到安全的哥伦比亚大学后，他与弗洛伊德的学术分歧越来越大，尽管从未完全背离。弗洛姆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学派的视角中脱离得太快，走得太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受到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朋友赫伯特·马尔库塞^[1]（Herbert Marcuse）的指责，说他打算抛弃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而阉割精神分析。作者弗里德曼也在传记中解释了为何马尔库塞会做出这样的批评。更通俗地说，他比其他任何学者都更详尽地描绘了弗洛姆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他们偶尔一致的重要观点——即使从长远来看理论分歧逐渐增长。与其

[1] 赫伯特·马尔库塞，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译者注

说他们互相轻视与排斥，不如说是在观念上进行着你来我往的“舞蹈”。实际上，他们俩可能在巴登-巴登^[1] (Baden Baden) 有过直接接触，一起讨论他们的理论观点。这些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部传记非凡的深度与成熟度。伴随着许多新发现的证据，令人兴奋的解释也大量涌现。

纵观弗洛姆的一生，除了吸引了像大卫·里斯曼^[2] (David Riesman)、小亚瑟·施莱辛格^[3] (Arthur Schlesinger Jr.) 和罗伯特·林德^[4] (Robert Lynd) 等几个人之外，他在学术圈的人气并不高。尽管弗洛姆很少提及他遭到美国学术圈的排斥，但他感受到了那里狭隘的视野、局限而特定的兴趣领域，甚至是使用的词汇也与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问题不甚相干。因此，他将自己的作品创作面向普罗大众，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它们受到的欢迎简直就是惊人的。这些书的销售额不是数以千计，而是数以百万计。事实上，只有一本书的销量在一百万以下。最高纪录是由《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 创造的，这本书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出版以来，已经卖出了 2500 万本，至今仍然畅销。弗洛姆对于爱的珍视，对于战争的仇恨，对于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投入，对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人道主义的倡导，使他成了 20 世纪读者数量最多、最受钦佩的人物之一。弗里德曼运用艺术散文的写作手法，加上他洞悉万事的敏锐眼光，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故事——它是一部令人叫绝的学术传记。

虽然弗洛姆受到公众极大的欢迎，对政界要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中还包括三位总统候选人，但他的书籍却从未引发过美国教授们的共

[1] 巴登-巴登，德国西部的一座小城。——译者注

[2] 大卫·里斯曼，美国社会学家，其代表作《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探讨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及演变。——译者注

[3] 亚瑟·施莱辛格，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因其父也为著名历史学家，为有所区别，人称小施莱辛格。曾先后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特别顾问。——译者注

[4] 罗伯特·林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代表作《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译者注

鸣。后来，这些书几乎持续畅销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受到许多国家元首甚至是教皇的褒奖，也是各地学生群体的最爱。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有引起美国教授们的兴趣。个中原因一直有几分神秘，毕竟他受到了德国、意大利、瑞士、墨西哥等大多数东欧国家学者的称赞。

弗里德曼教授的这部杰出著作，文笔优美，观察入微，如此生动有趣且发人深思，必将唤起人们对弗洛姆生平的关注。本书基于对多个国家和多种语言的大量原始手稿和印刷品的广泛研究，从弗洛姆在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中的童年开始，追溯了他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弗洛姆所受的宗教教育为他以后的人生方向埋下了伏笔。弗里德曼演示了文化与环境如何塑造了他的思想和性格以及后来引导他走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人想起《希伯来圣经》里的先知。这部传记如此生动有趣、构思精妙且公平公正，以致于将会有许多读者愿意像弗洛姆一样去战胜生活中的困难。我很清楚弗洛姆对于现代社会有很多话要说，而弗里德曼的这部传记将有助于社会重新燃起对这位传奇人物的兴趣。弗洛姆应该会很高兴看到自己的生平被如此详尽且公正地公诸于世。不得不说，弗里德曼用这部作品向人们证明了他作为一名传记作家和曾获殊荣的历史学家的卓越才能。

杰拉尔德·格劳博 (Gerald Grob)

前 言

1958年的夏末，我正准备离开洛杉矶我父母和祖父母的家。不久之后，我将成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一名新生。我与来自东欧的移民祖父一起观看了一档名为《迈克·华莱士秀》（*The Mike Wallace Show*）的电视节目，它是节目《60分钟》（*Sixty Minutes*）的前身。华莱士与弗洛姆进行了一个一小时的访谈，介绍他是一个拥有两种“生活”的人——其一，是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家；其二，是与俄罗斯人和平共处的主要拥护者。在访谈期间，弗洛姆别有风味地扩展了华莱士对他两种生活的描述：首先，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精神分析取向的临床医生；其次，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位政治活动家；再次，他是一位社会批评家；最后，他是一位致力于指导社会的作家。弗洛姆强调，这些角色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或不相干的，而是联系在一起——通过他在面对人类看似无法超越的敌意、暴力和战争时，将自己视为一位热爱生活的先知而实现整合。

在接下来的52年中，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在安克·施赖伯（Anke Schreiber）的大力帮助下，我开始与弗洛姆这位文艺复兴者进行概念化，有时是个人化的对话——关于他的思想，他的“生活”和他的内在冲突。这些冲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是一个敏感的人道主义者，他需要碰触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从精神到审美，但他同时需要将存在的方方面面放入限定的内容（他的“生活”），从而处理日常经验中的必要方面。反过来，弗洛姆的这两个方面——个人化与概念化——又猛烈碰撞。

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我认为，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概念分歧与其说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架构的反叛性拒绝，不如说是两个文明的欧洲人在心理和精神生活领域进行的一场礼貌的自由舞蹈，这两人都因为希特勒残忍和暴力的独裁主义而背井离乡。他们俩都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在海外重新界定日常存在的各种角色与需求。此外，他们都以相似

或不同的方式去寻找一个分水岭，试图将文明社会的礼仪与野蛮和大屠杀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1930）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都是这种概念性与精神性研究的代表。这是一场涉及两位实践派精神分析家的思维与情感的“舞蹈”，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基于特定的环境去解释 20 世纪的破坏性潮流。弗洛姆得出结论：爱就是解药。而弗洛伊德则没那么乐观。

在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生活中，弗洛姆从来没有实现他的主要政治理想，即由爱封存的永久的国际和平和正义。尽管其间有一些神奇的时刻——他对于世界无战事的先知愿景引起政府高官的重视，最好的例证就是在冷战期间最危险的时刻他对肯尼迪总统的影响。

1960 年秋天，弗洛姆在《代达罗斯》^[1]（*Daedalu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武器控制和裁军的文章，引起了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注意。在这篇文章中，弗洛姆建议美国向苏联政府提出一连串的武器削减要求，最终目的是消除所有的核武器。他也呼吁美国政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裁军署。就职总统的 10 个月内，肯尼迪便提议国会建立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肯尼迪还要求他的顾问考虑弗洛姆持续向苏联政府施压的建议。作为回应，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2]（McGeorge Bundy）收集了弗洛姆关于苏联和德国政治的数篇文章，放入总统办公室的作战指示材料中。这种间接的接触一直持续到 1962 年，那时古巴导弹危机差一点导致了核战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危机之后，肯尼迪很快就与弗洛姆通电话了。后来在 1963 年 6 月，在美国大学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这位总统明显放弃了他一贯的鹰派冷战言论，并且强调与苏联和平共处以及核裁军的必要性，以此作为避免全球性毁灭的手段。显而易见，许多作战指示文件和与“局内人”的私人对话促成了这些演讲。但是，肯

[1] 《代达罗斯》，创办于 1955 年的同行评议学术期刊，以替代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会议记录，1958 年开始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学报》的季刊发行。——译者注

[2] 麦乔治·邦迪，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专家，曾担任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译者注

尼迪的推理论证、他呈现的道德价值，甚至演讲当中一些特定的语言，都与弗洛姆的部分文章有些接近，特别是《代达罗斯》中的那篇文章。

在冷战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全球性的核毁灭随时都可能发生。其间美军派兵越南遭遇惨重的损失、民权运动和对于人性尊严的全球呼声渐长、弗洛姆的公开演讲和出版书籍以及他慷慨的捐赠，这些都大大鼓励了和平与人权活动家为世界无战事而大声疾呼。在此，像弗洛姆在不那么政治化的生活中一样，他经常使用先知性的语言描述自己——一个对全球人类肩负使命的人。为了这个目的，他帮助建立并资助国家理智核政策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而且积极领导这两个组织。

在他那些有影响力的官员朋友中，弗洛姆的地位举足轻重。阿德莱·史蒂文森、威廉·富布赖特、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经常在国际事务上求教于他。他与资深的国会议员、联合国官员和肯尼迪政府的要员进行谈话。虽然他对全球问题的新信息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但他的先知倾向有时限制了他与政治家的沟通效果，这些政治家习惯于政治进程中所特有的妥协和逃避。尽管如此，在他所建立的联系中，弗洛姆帮助建立了一座时有畅通的桥梁，一头是和平与人权主义人士及其盟友，另一头是高级政府官员的审议意见。在20世纪60年代，我确认了弗洛姆作为活动家和理论家的身份。当然，我不赞同他关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但是他在美国和平运动中所做的工作，在冷战最危险的时期拒绝严惩被称为“恶魔”的俄罗斯人，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和激进主义倾向。事实上，它激励了我参与1964年的“密西西比自由之夏”^[1]，以及努力扭转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这种激进主义的延展有助于我形成从那时起所有著作的主题架构，并且推进了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政治冒险。那种政治实践主义的精神——我的和弗洛姆的，在《爱的先知——

[1] 1964年，美国国会的种族平等组织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选民登记运动，旨在大幅提高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选民登记数量。但在媒体看不到的地方，对“自由之夏”志愿者的殴打、暗杀和关押持续了整个夏天。——译者注

弗洛姆传》(*The Lives of Erich Fromm : Love's Prophet*)这本书中显露无遗。

弗洛姆作为社会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受益于他卓越的写作能力，他能以简单而直接的著作传达精神分析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理论、社会哲学、文化创作等领域复杂的思想，而这些著作抓住了他那个时代潜在的理想和恐惧。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亚里士多德、歌德、席勒、托尔斯泰、赫尔曼·黑塞^[1]、爱因斯坦、罗素和其他知识巨人的读者，在弗洛姆那清晰明了的著作中接触到了他们的思想，而且这些著作将他们置于当代世界的特定问题和焦点的背景之中。例如，弗洛姆通过这些令人敬畏的思想家来批评消费主义文化、企业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独裁主义。换言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恋生欲 (biophilia) ——对生命的热爱和充满爱的生命——的一位先知。

弗洛姆 1956 年出版的《爱的艺术》在全球销量超过 2500 万册，这本书深受我的哈佛大学本科生的喜爱，就像半个世纪前深受我和加州大学同学们的喜爱一样。这本著作紧密联系着好几代读者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弗洛姆最深刻和最重要的作品是《逃避自由》(1941)，这本书剖析了希特勒时代独裁主义的社会心理，被翻译为 28 种语言，销售量超过 500 万册。

弗洛姆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全球性教育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任何一代，几乎没几个知识分子或学者可以当之无愧。这个事实对这本传记的主题结构贡献重大，因为在弗洛姆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经验与他所在社会的恐惧和希望有明确的联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尤其如此，当时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学生抗议运动与美国的学生运动趋同。弗洛姆的书籍和公开演讲反映了当时的问题，并在全球层次上提供基本的指导。

在犹太人大屠杀、广岛原子弹和越南战争之后，一小部分社会评论

[1] 赫尔曼·黑塞，德国作家，诗人。出生在德国，1919年迁居瑞士，1923年46岁时入瑞士籍。黑塞被誉为德国浪漫主义的“最后骑士”，也是20世纪最具透视心理和灵性创意的作家。他是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曾是荣格心理分析的“病人”。——译者注

家、学者和公职人员像弗洛姆一样在公共论坛上宣布：国家和民族主义造成的伤害多于带来的益处。他们呼吁“一个世界”和“人类家庭”，但他们当中没有几个人像弗洛姆一样清晰合理地提出这个号召，也没有人能够说服数百万的听众去重新思考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弗洛姆在国内和国际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使他在许多美国学术圈中有几分失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倾向于远离教授职位，远离专业图书馆和数据库，远离美国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方式。弗洛姆站在局外，窥视着他的朋友——著名的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所谓的“学术革命”。在那里，社会科学中的单元变得高度具体化，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语言”、专业领域、子领域和严格的研究与写作标准。

弗洛姆难以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学者获得认可还有一些其他因素。1955年，他与赫伯特·马尔库塞偶遇。马尔库塞是他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朋友，也是一名声誉良好的哲学家和学者。他阅读了弗洛伊德抽象的理论书籍，熟悉精神分析，但他缺乏临床实践或者对治疗经验的了解。这两个人在某几期的《异议》（*Dissent*）杂志上唇枪舌剑，这是纽约一本对于战后知识分子和文化话语而言非常重要的杂志。与18年前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同事西奥多·阿多诺^[1]（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2]（Max Horkheimer）对弗洛姆的抨击相呼应，马尔库塞也指责弗洛姆已经掏空了精神分析的革命性内容，抛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前提——性驱力根植于生物实体，为人类人格提供能量。换句话说，马尔库塞指责弗洛姆绕过了一些学者所谓的“现代主义”议程——对于从社会的操纵和压抑（即超我的约束）之下解放人类内在性的“弗洛伊德式”探索。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左派思想家（其中一些人被称为“纽约知识分子”）认同了马尔库塞的指责。这在一些学者中持续了一段时间，并

[1] 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译者注

[2] 马克斯·霍克海默，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且在那些顽固分子当中长期存在。

但是，马尔库塞的指控并不妨碍其他人对弗洛姆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全球教育家的大力支持。马尔库塞的指控也不能说服里斯曼放弃将弗洛姆的理论作为弗洛伊德的替代——一个模糊的“社会性格”的概念：外在的社会结构重塑个人的内在冲动并为其提供人生的方向。事实上，在大卫·里斯曼那本经典且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孤独的人群》中，对于其主题框架的构建，里斯曼便大量借鉴了社会性格的概念。此外，自20世纪40年代初，本杰明·斯伯克^[1]（Benjamin Spock）在教育父母要避免他们对其孩子强加过度的控制时，就对弗洛姆的“权威主义性格”的观点大加利用。教皇若望·保禄二世^[2]（John Paul II）谈到弗洛姆是人类的一位伟大老师，评价他的《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 ?*）是一本非凡的精神著作，他还邀请弗洛姆到梵蒂冈讨论精神指导的问题。这些例子均强调了弗洛姆在学术界之外重大和持续的影响。如果他在作为学者的冒险活动中遇到困难，他的其他生活并不会受影响。

另外，在他作为社会评论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弗洛姆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卡伦·霍妮^[3]（Karen Horney）、保罗·拉扎斯菲尔德^[4]（Paul Lazarsfeld）和保罗·蒂利希^[5]（Paul Tillich）。他们的著作和公共话语是夹缝中的产物——一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独裁主义的欧洲政府，另一方面是冷战时期的核战争的前景。像弗洛姆一样，这一代人当中许多人都是世俗的犹太人，经历过法西斯主义的可怕遭遇；同时他们提出了许多棘手的话题，包括原始的偏执、大量

[1] 本杰明·斯伯克，美国著名儿科医生。——译者注

[2] 若望·保禄二世，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梵蒂冈城国国家元首。——译者注

[3] 卡伦·霍妮，德裔美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新法》《我们的内心冲突》《自我分析》《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她曾与弗洛姆有过一段恋情。——译者注

[4]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美籍奥地利人，著名社会学家。——译者注

[5] 保罗·蒂利希，美国神学家，宗教哲学家。——译者注

的异化、粗暴的民族主义以及人类消灭数百万同胞的潜力。大多数思想家从一个普世主义者的角度慢慢转向了多元主义，这种多元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承认了人们的共同性，同时也不否认他们之间的差异性。

现在，这些思想家被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之前，这个称呼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选择了其他被认可和被调用的术语——“社会评论员”，甚至是“社会哲学家”。虽然这些人也身处学术界，但他们的写作范围比专业化的同事更为广泛。他们对学术专业领域、同行评议的要求和仅限于“专家”的会议表示不屑。相反，他们研究跨学科的重要问题并处理普遍的人文关怀。像弗洛姆一样，许多人在避开系统性研究、跳过专业知识和原始文献的关联时，他们的写作速度很快而且很吸引人。通常，他们反复论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数十年后以有趣的方式重述它们。

对于一个和平、宽容和不断全球化的文明社会的愿景，将弗洛姆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以前残酷的战争和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对这样的愿景像是诅咒，因此弗洛姆与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结成了同盟。他与汉娜·阿伦特^[1] (Hannah Arendt) 合作，对新的以色列国家及其对阿拉伯邻邦的默默容忍采取行动。弗洛姆还与爱因斯坦建立了直接联系，参与和平与裁军的活动，特别是那些致力于缓减中东地区紧张气氛的活动。他与玛格丽特·米德^[2] (Margaret Mead) 及其跨学科圈子中的人一起工作，将新的文化理论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动荡地区。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弗洛姆促进了备受重视的社会学系与迁至此处的法兰克福研究所之间关于宏观公共问题的学术合作。某个

[1] 汉娜·阿伦特，20 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早年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 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 年到了美国。——译者注

[2] 玛格丽特·米德，美国人类学家，曾担任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美国人类学会主席，美国现代人类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被誉为“人类学之母”。——译者注

时刻，他曾说服西奥多·阿多诺、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和 C. 赖特·米尔斯^[1]（C. Wright Mills）聚在一起，分享他们对于战后人们的恐惧、偏见和偏执的政治作风的看法。

尽管将弗洛姆的全部“生活”悉数描述很难，但并非不可能。学者们的焦点——从弗洛姆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显露出的观点——不断被用于思想传记中。他们当中有一些作品很好。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弗洛姆的个人生活与他的思想贡献是相互塑造的。我们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弗洛姆曾告诉他的第三任妻子，在他逝世之后毁掉他所有的私人信件。幸运的是，我们仍有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请看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所知道的弗洛姆的线索性概念——社会性格，在他的大部分出版物中都有所呈现。最清晰的三个解释分别出现于：一篇 1932 年的文章《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联系》（*Psychoanalytic Characterology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Psychology*）、《逃避自由》（1941）和《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 1947）。在一段关于社会性格本质的解释性陈述中，弗洛姆写道：“性格可以被界定为人类能量在社会化和同化过程中的活动方式……性格系统可以被视为人类身上与动物本能类似的东西。”为了澄清社会性格的本质，区别于弗洛伊德学派或现代主义关于本能与约束的范式，弗洛姆写道：“社会生产的驱力是人类所特有的，它必须被解释为对于特定的社会条件的适应的反应，而不是作为本能的‘升华’。”这是弗洛姆对社会性格最清楚的解释。那么这一概念的背景是什么呢？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他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最后几年——弗洛姆在信件中向同事解释，他倾向于抛弃弗洛伊德关于力比多能量位于个体人格核心的假设。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希特勒爬升到总理的位置之前，他对德国工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进行研究时就形成了这些保留意见。尽

[1] C. 赖特·米尔斯，美国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译者注

管应该给予弗洛伊德公正的评价，但弗洛姆在这项研究中还是发现必须寻求性欲理论的替代选项。弗洛姆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同事们紧紧抓住弗洛伊德早期作品的字面意思，甚至在弗洛伊德抛弃了它们之后仍是如此，这些同事感到弗洛姆背叛了他们，并要求弗洛姆结束他的研究。

在1939年霍克海默让他离开之后，弗洛姆通过收入颇丰的私人精神分析实践来支持自己，这使他可以自由地充实他正在形成的社会性格的概念。在写作《逃避自由》的时候，他再次质疑弗洛伊德的性欲冲动中心论。首先，他推断自我生来并不是约翰·洛克^[1] (John Locke) 所谓的白板——一块没有独特的经验特质的白板。弗洛姆观察到在出生时和出生之后，人类立即就形成一个社会化的个体。从那时起，一个人的自我就形成了，并且通过个人独特的人格和情感与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不断被塑造。弗洛姆正在思考他的社会性格的概念，但仍然还没有形成定论。

弗洛姆在其余生中不断修改这个概念，有时将其更加钝化，有时使其更加清晰。自始至终，关键问题是在他的社会性格这一概念中，弗洛姆有多愿意承认性驱力的重要性（它仍是弗洛伊德追随者，现代主义议程的中心）。有时，他认为性驱力仅在社会性格形成中起到次要作用，特别是在他于法兰克福研究所工作时发展的早期构想中。但另一些时候，他认为性驱力和更普遍的人类能量绝对处于社会化过程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从他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开始，他仍然经常（但不是一直）把性驱力放在重要的位置。为什么他变得如此之快呢？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果断和坚决？当问及此事时，他认为，他的治疗技术和病人身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改变了构想，而且在他反复思考社会性格的元素时，他的病人经常是他的老师。随着他的临床经验的变化，这个概念也就改变了。简单地说，弗洛姆强调他作为执业精神分析师的生活，与他作为人格理论家的生活不是分离的。这两种生活总是相互关联的。

[1] 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在知识论上，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洛克提出了心灵是一块“白板”的假设。——译者注